

历史上的书院不仅是教育的重要补充，更是文化传承、社会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载体与渠道，它对培养人才和引导社会文明风尚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今天，书院不仅是传统文化传承和展示的窗口，更是作为一种活态化的文化形态日益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文化活动的重要实践空间，还蕴蓄着独立自主、理性思考、启迪教育、教化国民等精神存在，是守护和创新民族精神的一种载体。

书院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是古代东亚教育制度有别于官学的一种独立教育系统，通常由富商、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千余年来，作为我国独特的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在历经辉煌、困顿和沉寂中，书院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英才的重任，如至今仍然“活着的书院”岳麓书院就是其中的典范。有专家统计，中华大地上曾存在过的书院有8000多所，可以说书院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重要传承方式之一。据历史记载，书院开始只是地方教育组织，最早出现在唐朝，其正式的教育制度由理学家朱熹创立，发展于宋代。宋代著名的书院有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的石鼓书院、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书院的文化传承及其精神蕴蓄功能

□ 范玉刚

的意见》提出，要保护文化遗产。书院作为古人读书、讲学、做学问之地，历经千余年发展，已累积了对文化传承、教育、艺术、哲学、社会礼仪等多方面认知，是文化宝藏、精神蕴蓄的重要载体，对推动文化传承、民族文化振兴有着重要价值。文化创造、文化积累和价值传播是书院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一种传播方式，其精髓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正心明德思想，一种使命的自觉担当。正心在求真问学、不以一己之是非为是非；明德在发扬自身光明之德，践履匡济天下之任。这种教育理念和文化传播方式，之于当下教育如何培养人才和教化人心不无启示价值。

新时代语境下，书院的功能应定位于文化空间，继续成为文化传承和蕴蓄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实现推动文化繁荣的活态化载体。书院的辉煌始于教育，传统书院人数不多的小规模、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以及朝夕相处的论道，是其生命力所在，也是打动人、感染人，令人不胜唏嘘之处。王阳明、黄宗羲等大师风格活泼，注重挖掘学生的自主性，在相互启发中悟道的方法，至今仍是研究生教学中的方法之一。当下，尽管书院在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上可以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尽管岳麓书院已是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很多书院正在被新建或复修，但它毕竟不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渠道或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的书院大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院，但它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精神价值是永存后世的。

文化传承是书院存在的重要功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书院对我国教育、学术、建筑、藏书等事业的进步，对民风民俗的养成，对中华文明的传播都作出重大贡献。受古代文化传统中以山水比德和隐士文化的影响，中国书院往往坐落于环境优美和文化基础浓厚之

地，多选址于风景名胜，总体布局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理念追求，建筑多由大门、门厅、讲堂、斋舍、藏书楼等功能性空间和包括泮池、泮林、泮桥、碑、文庙等在内的非功能性空间构成。教化指向与功能布局相互契合，按照准备、入门、受教、崇礼四个意义单元，使学子在跨越龙门、登堂入室、虚心受教、虔诚守礼的过程中，将知识获取与人格修养相互切近，在仪式性和象征性中得以强化。书院建筑在考究整体布局的同时，对书院个体建筑形式的推敲和细节的艺术化处理，彰显了中华美学精神和理学内蕴。作为体验传统文化的基地和传统文化传承空间，只有使之活态化地成为当今文化实践的场所，让学生

的琅琅书声和文明礼仪教化激活书院的灵魂，成为区域文化高地，才是对它最好的利用和弘扬。

除了文化传承，独立自主理性精神的蕴蓄应是书院存在的另一功能。书院的终极意义是给人以思想，教人们学会思考。儒家特别注重成人教化，个人立足于社会最重要的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书院的教育往往以此来展开，这是一种精神的启悟。中国文化追求知行合一，书院的特点之一就是求道与求学的统一，也就是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的统一。这种独立自主、理性批判精神，在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强国进程中格外值得重视。如岳麓书院就承载了湖湘文化精神的传统：经世致用、关怀现代、关心社会、改变中国，使得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蔡和森等诸多彪炳史册的人物，都曾受到其思想和精神的浸润。

因此，书院文化的复兴，不能止步于有形的物质层面的建筑房地产，而要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凸显其既适合当下又再现传统的精神追求、价值启迪和生活方式，发挥其提升当代中国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文明程度的作用。



传承地方书院文化 办好现代干部教育

□ 朱永刚

湖北襄阳地域文化积淀深厚，荆楚文化、三国文化、诗歌文化、战争文化等在襄阳都有精彩表现。书院文化是襄阳地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华章，坐落于古城襄阳书院旧址的襄阳市委党校，在多年办学历程中深得书院文化的润泽，使得书院文化在新时代的襄阳干部教育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襄阳书院在襄阳城內西南、今襄阳市委党校院内，现原址留有石碑一幢，石碑正中为“襄阳书院”4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上款为：“大清雍正四年冬十月”，落款为：“襄阳郡

守大梁高茂选捐”。襄阳书院始建于清代，据光绪《襄阳府志》载：康熙六十年（1721年），襄阳守道赵宏恩将襄阳府试院由荆州北街迁到此地，改建为襄阳书院。襄阳书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中共襄阳地委机关所在地，1956年起作为中共襄阳地委党校校址，1983年地市合并后作为襄阳市委党校校园至今。襄阳书院是古代众多襄阳地方书院的代表，也是襄阳留存至今的少数书院遗迹之一。

襄阳的书院起于东汉末年，荆州刺史刘表在治所襄阳“开立学宫”。自元至清，襄阳府及所辖各县逐步建立书院，达到鼎盛。据《襄阳府志》和《襄樊教育志》记载，襄阳府及所辖各县书院共21所，包括乳泉书院、襄阳书院、岷山书院、鹿门书院等。各书院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最繁盛的时期当属东汉末年，诸葛亮、庞统、徐庶、马良、石广元、孟公威、马谡、廖化、杨仪、董恢、尹默、李翼、魏辅、潘睿等一大批名士才子都在此求学。整个三国时期，襄阳堪称人才高地、文化高地、精神高地，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唐至清代，襄阳府书院培养出的人才有杜审言、张柬之、柳浑、张士逊、范宗尹、任亨泰等，或官居宰相、大夫、尚书、大学士、侍御史，或任巡抚、知府、知州等要职。

襄阳书院在襄阳府书院中是比较典型的代表，和众多书院一样具有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意志和精神追求，主要体现了4个特点：一是知行结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非常重视学生道德修养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奉行“尊德行而道问学”，将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与个人的道德修养、品行修为有机地结合。在学问传授上强调实用性，并大力引入新式教学。近代“五四”前后，襄阳书院兴办了全市第一所染织学堂，并附有实习工厂。二是严格考课。考课是书院对在读生童学业的检验和考核，经过长期的发展到清代已经成为书院的重要制度，“书院以考课督士，以清代最

盛”。襄阳书院的考课自然是比较严格的。三是“思辨”教学。教学方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经常聘请有名望的学者讲学。崇尚创新、务实的治学思想，推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自由辩论。四是官治民助。明代襄阳书院的教育功能开始明朗化，并且具有官学色彩，襄阳书院应该也是这种办学形式。

襄阳市委党校坐落古“襄阳书院”旧址之上，在办学过程中不仅接受着传统书院文化的陶冶和熏陶，同时也传承、发扬传统书院文化。

襄阳市委党校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把对党忠诚、为民服务、清正廉洁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目标，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科学设置教学布局，精心选择培训方式，在培养造就“四铁”干部队伍上不断迈出新步伐。

注重传承书院“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把现场教学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经过连续多年的实践探索，到2018年底已分类别在老河口、南漳、谷城、保康等县市确立了红色教育、绿色发展、循环经济和党性教育4条不同的现场教学线路，确保学员在实景实情中增强感性认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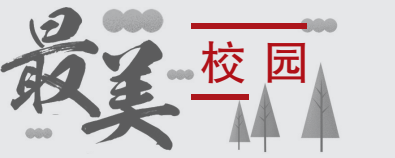
注重传承书院“严格考课”文化。为确保党校校园风清气正，襄阳市委党校以铁的纪律强化学员管理。修改完善《学分制管理办法》《学员请假制度》《学员培训纪律规定》等，从培训的政治纪律、生活纪律、学习纪律三个方面对学员提出明确要求。

注重传承书院“思辨”文化。近年来，重点打造形式新颖、相互学习的互动式课堂。广泛运用2+0.5互动式教学，辅以案例教学、情景模拟、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通过教师和学员的互动交流，达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的目的。坚持不懈开展主题教学活动，组织引导学员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开展调研，撰写调研文章，提出有针对性的决策咨询建议，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和学有所悟学有所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襄阳书院文化作为襄阳优秀的地方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文化血脉，在挺立民族脊梁、凝聚民族精神、涵养民族元气以及传承中华文明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襄阳市委党校将进一步挖掘、传承和发扬书院文化的富矿，让其在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江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新校区会议中心



中国古代涵养政德的方法

□ 陈方刘

重视政德修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特点和优点。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都有关于“涵养政德”方面的大量相关论著，散见于一些著名的经典古籍中。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思想。在《论语·为政》中，孔子明确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大学》开篇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丰富的政德修养文化。

博学于文。根据《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如要治国平天下必先修身立德，而修身立德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读书。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与道德密不可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是政德修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读书也历来是涵养政德非常重要的入手处，正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讲：“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对于当官为政之人而言，甚至学习的首要目的不是丰富知识而是提升道德。科举制度在隋唐逐渐完善之后，当官入仕必须要学习儒家经典，这一制度不仅提高了官员的文化水平，也提升了官员的政德修养，培养出很多清官廉吏官员。

约之于礼。涵养政德既要靠自律，也要靠他律，约之以礼就是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通过“克己复礼”的功夫，转化为对“仁”的自觉追求，这就是“克己复礼为仁”的过程，并最终实现“不逾矩”。《吕

氏春秋·不苟论》中讲：“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而当官为政之人尤其不能破坏规矩，在《论语·八佾》中，孔子对于鲁国大夫季氏用“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说了一句妇孺皆知的名言：即“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管子·牧民》中把“礼义廉耻”看作“国之四维”的第一维，并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心存敬畏。为官者要在各种名、利的诱惑面前保持定力，心存敬畏，这样才会行有所止，做到《大学》所讲的“知止而后有定”。历次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让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当官为政不仅要敬畏历史、敬畏礼法，还要敬畏人民。《尚书·五子之歌》中就已经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重要命题。周初的统治者虽然认可天意，但也认为天意就是民意，正因为如此，汤武革命才顺天应人。西汉思想家贾谊在《新书·大政上》深刻指出：“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因此他向为政者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慎独慎微。一般来说，在有监督的情况下，人们通常会注意自己的德行，但在无人时、细微处容易放松要求。而这恰恰是涵养政德的关口和良机，慎独要求为官者在面对诱惑时

要不断进行反躬自省，始终做到表里如一。宋代吕本中在《官箴》中开篇就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与慎独相联系的还有慎微，为官者要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防止一失足成千古恨。据《康熙政要·论君道》中记载，康熙曾言：“凡理大小事务，皆当一体留心。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可不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杜，必至于不可杜也。”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在著名的《禁止馈送檄》中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知行合一。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风向标，涵养政德既要化知识为德性，还要化知识为德行，从而实现知行合一，绝不能做《孟子·尽心下》中所讲的“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人。《中庸》中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王阳明在《传习录上·徐爱录》中指出，如果“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中又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荀子也特别赞赏言行一致者，他在《荀子·大略》中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荀子把能言能行者看作国宝，认为治国者应该敬其宝，爱其器。

